

学海星光

毛泽东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夏海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吾始于是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是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犯错误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两个途径，一是别人发现，听取别人的批评；二是自我发现，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因在于共产党掌握着真理，“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在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在于共产党胸怀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

毛泽东充分论证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首先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论证，认为党内存在着矛盾，“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而“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同时，从现实角度加以论证，认为党的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更重要的是党内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和做法。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氓思想以及盲动主义残余，“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的”。延安期间，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经常存在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给财政人民委员书》）。1953年1月，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文件，印发各地各部门执行。1960年3月，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专门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文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要求各地各部门“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还以房子和人脸为喻体，生动形象地论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打扫和洗涤灰尘，当然，不是打扫房子的灰尘和洗涤脸上的灰尘，而是打扫和洗涤政治灰尘和微生物，“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们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

党内工作中缺点以及思想上错误的主要方法。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部会上说：“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就个体而言，是要治病救人，帮助党员尤其是干部克服工作缺点和错误思想，“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办法”。那么，如何治病救人呢？“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就整体而言，是为了惩前毖后，使得个体不会因小过而犯大错，更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集体则可通过他人的缺点错误，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犯他人犯过的缺点错误。就整体而言，有利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利于增进党的团结，“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有利于增强党的战斗力，“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毛泽东不仅创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而且找到了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效途径，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动员讲话，“主张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味着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思想动员；第二阶段是整顿三风；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是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运动相结合起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实际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次是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着力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国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后是发表了《反对党八股》，“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强调，整风是一个整体，要通盘考虑，综合推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他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实现了党内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找到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实践途径和可靠载体，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物 掠影

张平：为人民写作

本报记者 杨雪

近日，2023天府书展正式开幕。“一曲在淬炼中成长的正气歌——张平长篇小说《换届》新书发布会”在书展上举办。张平的《抉择》曾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23年，《换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四川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换届》主人公杨鹏风华正茂，有情有义有担当，是在一线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作为年轻的副省长杨鹏受命到临锦市考察民生状况，他深入一线，见到了许多料想不到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小说把握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动态，描述组织部门在甄别、选拔、任用干部中必须具备的胆识与魄力，书写干部在风浪中的成长。

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换届》是一部题材独特、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几年来，张平从构思故事、确定主题，到交出文稿，夜以继日，几易其稿。整部小说承载着作家的人生积淀，凝聚了他多年从政的经历及从事创作以来的深刻感悟，希冀唤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张平一直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创新。《换届》更是超越了他以往的反腐作品，在文学方面显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

“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发声”是张平自创作以来所坚持的重要原则。看过他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熟悉基层生活，始终关注的是当下时代、当前社会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从《天网》到《凶犯》《孤儿泪》《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再到《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所有这些作品，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张平说，之所以执着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这些作品里面的人与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叶广岑：中华文化是创作源泉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活动之一“走进叶广岑的儿童文学世界——《猴子老曹》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秦岭深处的曹亮沟里，金丝猴王老曹带着猴子猴孙钻天入地搞破坏，把人气得人牙根痒痒。可猴子们又有情有义、可爱至极，它们能在关键时刻助人逃离险境，也能在平淡日子里与人彼此守望。唐安村的小女孩孩儿与猴子们有着深深的牵绊。寒冷的冬日，她会跟爷爷一起带着吃食去投喂饥肠辘辘的猴群；当村里组织的“圈猴”行动，要把老曹一家一网打尽时，她冲进包围圈，帮猴群重获了自由……《猴子老曹》是叶广岑扎根秦岭完成的创作，书中展现出了多彩神奇的大自然和生趣盎然的人生世界。作为“动物与孩子”系列作品之一，叶广岑用她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秦岭，领略秦岭迷人的自然风光，感受秦岭人豁达通透的精神气质，思考动物与人的关系。

在发布会上，叶广岑回忆了自己在秦岭九年不少难忘的生活，她表示，中华文化是自己创作的源泉，作为作家必须要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要深入到基层，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作品。

刘学俊：唱响丝绸之路上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张丽

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出品的民族交响原创歌剧《莫高窟》被改编为音乐会版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莫高窟》通过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命运变迁，描绘出西域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生活画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阐释歌剧《莫高窟》的创作意义时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源泉，民族交响歌剧《莫高窟》以丝绸之路为背景，以敦煌壁画为题材，通过小人物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宏大的时代主题——只有国家的安定，才有人民的幸福。这部作品不仅凝结了传承久远的丝路精神，也承载着深厚的中华审美，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国庆长假期间，将民族交响歌剧《莫高窟》以音乐会的形式再次搬上舞台，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台具有民族性的经典剧目，是中国广播艺术团作为国家级院团的责任和担当。”刘学俊坦言，歌剧《莫高窟》曾于2018年首演，无论是素材选取、剧本编写、音乐创作、演员呈现，还是舞台景致和服化道的设计，都生动还原了唐代历史及风土人情。“这样一部优秀的原创作品，我们应该不断地去演出，让老百姓能经常欣赏到，而不是演过之后就束之高阁。”刘学俊说道。

此次上演的音乐会版《莫高窟》将原有曲目进行筛选，保留了全剧精华，提炼了核心唱段，演出涵盖“大漠一曲舞胡旋”“妙笔生花绘伽蓝”“铁马金戈犹泣血”“敦煌绝迹千年”四幕。刘学俊表示，下一步将把歌剧《莫高窟》制作成组曲，选取最精华的旋律再度浓缩，推动经典作品常演常新。

钟振振：既要传承 更要发展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以“中华经典诗词与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诗圣故里河南巩义举办。论坛上，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振振从诗歌创作、诗歌发展史观、诗歌创作主张、唐人的“当代诗”的经典化等多方面论述了中华经典诗词要传承更要发展。

他认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对于文化学习的需求日益突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诗词热”和数以百万计的“诗词人口”，每年千万首的诗词数量，正是这个需求的表征之一。

钟振振对于当代诗人词人及其所创作的诗词有传承又有发展，但是否“经典”、能否“经典化”的疑问，钟振振表示，他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40多年，同时也从事诗词创作和当代诗词的评论评选。他认为当代诗词确有“经典”，也一定能“经典化”。前提是要给时间让它们“沉淀”，要有足够多的“伯乐”把“千里马”挑出来。“经典化”的工作，不是少数人、短时间便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并持之以恒。当务之急，是披沙拣金、兼海为盐，编选各种高质量的当代诗词选本，撰写一批批高质量的评介、鉴赏当代诗词精品文章，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当代诗词文学史。

他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为例解释，在一个“诗词接句”环节，钟振振作为学术总顾问之一从古诗词经典中挑选三句，让观众接写下旬。他挑的第一句是清人赵翼《论诗》诗里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原诗全文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遴选最佳接句的过程中，他读到一位观众的接句是“我辈说诗正少年”，顿觉眼前一亮。诗词中的“文化自信”，气贯宣言。他说，如果中国年轻人都有如此壮志，何愁中华民族不秀出于世界民族之林？何愁当代诗词不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而发展成为新的经典？

大家小说

忆“访台三十年”

王安祈（台湾）



▲ 图为1993年国家京剧院第一次访台，中为于魁智。左为迄今与国家京剧院合作30年的台北传大经纪公司负责人蓝雅菁，右为于魁智的粉丝。



▲ 2023年，中秋节当天，王安祈（中）与于魁智（左）、李胜素（右）在台湾的剧场里合影。

慧眼相中，建议周敦仁先生邀李胜素来台与于魁智搭档，不久后李胜素调入国家京剧院，“当代京剧最佳黄金搭档”因传大艺术公司邀约促成的。台湾观众何其有幸，看着于魁智“长大”，目睹李胜素“诞生”！

我们每年看的不只是戏，更是人，剧场里随处可听到这样的话：“素素更漂亮了”，“于先生比去年瘦了，太忙啦”！有一阵子于魁智过于操劳而有黑眼圈，戏迷们心疼着急，纷纷打药膏寄送，来年再来喜见

他双目炯炯有神，戏迷“争功”，都说“是我的药有效”！

正是这份情深意切的真诚交流，国家京剧院来台形成“传奇”。

30年后的今天，再次来台，演出上有两大特色：一是六台大戏中有四场重现30年前首度来台盛况；二是向台湾观众展示传承的成果，于、李二位让新秀和自己分庭抗礼。

哪四场戏与1993相同呢？除了前文提到的《打金砖》，还有《杨门女将》《霸王别姬》和《龙凤呈祥》。

《杨门女将》首演于1960年，同年拍成影片。当时翻拍的影片里，杨秋玲（穆桂英）23岁，王晶华（老太君）24岁，等到1993年她们亲自站上台湾舞台，竟都是年过半百！近花甲，上台上台下一样唏嘘感慨。当时我在中山纪念馆发现采药老人不是影片里的毕英琦，一时无法接受，台幕后疯狂寻找打听，才知道早已去世，当时竟泪如雨下，大家都以为我认错他，怎么可能呢？但这份沧桑有谁能理解？

而今又过了30个年头，杨秋玲已登仙班，李胜素也正好是当年杨秋玲访台的年龄，带着学生朱虹分饰穆桂英。朱虹早已独当一面，已随李胜素来过多次，台湾观众已对她产生感情，这次饰演中段穆桂英，扎大靠主演“母子比武”，戏份不轻。百岁太君郭瑶瑶是年轻一代的老旦翘楚，嗓音高亢，气势惊人。全场喝彩不断。

第三出与30年前相同的戏码是《霸王别姬》，李胜素带来另一位更年轻的学生褚沅怡，与自己分饰虞姬。褚沅怡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没多久，嗓音扮相都与李胜素有几分神似。《霸王别姬》前半段虞姬的戏份不多，但出场的引子“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已足以“定生死”，戏迷一听便可掂出分量，李胜素让学生演虞姬的前半段，可见她对徒弟的信心，也可看出老师如此贴心地让得意门生循序渐近缓缓与台湾观众结缘。30年前的霸王与虞姬李嘉林、杨秋玲都已仙逝。物换星移，后继有人。